

【珞珈语言文学学术丛书】

新世纪文学论集

於可训◎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013031912

I206.7-53

41

【珞珈语言文学学术丛书】

於可训◎著



新世纪文学论集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I206.7-53

41



北航

C1639328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新世纪文学论集 / 於可训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3. 4

ISBN 978 - 7 - 5161 - 2088 - 0

I. ①新… II. ①於… III. ①中国文学—当代文学—文学
研究—文集 IV. ①I206.7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024649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李炳青
责任校对 张玉霞
责任印制 张汉林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中文域名: 中国社科网 010 - 64070619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市大兴区新魏印刷厂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3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 1230 1/32
印 张 14
字 数 338 千字
定 价 49.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 010 - 6400979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代序 混迹于一代人中间

——我所亲历的新时期文学与批评 (1)

一 新世纪文学研究

从新时期文学到新世纪文学 (49)

新世纪文学的困境与蜕变 (53)

新世纪文学研究断想 (72)

“中国经验”:存在与可能

——评新世纪文学的一种文化理念 (84)

二 新世纪长篇小说研究

最近十五年来的长篇小说创作 (103)

我看近期群众性长篇创作热

——近期长篇小说创作的一点观感 (120)

第八届茅盾文学奖读书札记 (128)

三 新世纪湖北文学研究

- 湖北的文学资源版图与近期文学创作 (145)
- “汉味”文化与武汉市民精神生活 (162)
- 我读《长江文艺》中篇小说专辑 (178)
- 极权政治的历史寓言
- 综说《张居正》 (187)
- 读《圣天门口》(修订版)断想 (196)
- 抗拒异化的诗人
- 读杨晓民的诗 (208)

四 文学批评与写作学研究

- 对现当代文学研究中“过度诠释”现象的反思 (219)
- 走向科学的文学批评
- 论文学批评的科学性问题 (227)
- 论文学批评的创造性特质 (244)
- 文学作品批评的模式与方法 (260)
- 重建批评的感悟 (278)
- 为写作学科鼓与呼 (284)
- 写作的革命和写作学的革命 (289)
- 论中国写作学科的现状和建设
- 以对“高等写作学教程系列”教材的
- 评述为例 (296)

五 国际会议、社会讲座文稿

- 在“东亚文学国际研讨会”开幕式上代表
中国学者的致辞（中英文）……………（307）
- 最近十年来中国的长篇小说（中英文）
——在“东亚文学国际研讨会”大会宣读的论文 ……（319）
- 中国写作学的历史与现状（中英文）
——在第四届“国际写作大会”上宣读的论文 ……（342）
- 近三十年文学的历史变迁
——在广东省中山市“香山讲坛”的演讲 ……（364）
- 当代大陆抗战小说的历史变迁
——在山东省“台儿庄古城两岸战争文学
论坛”上的演讲 ……（390）

六 其他

- 近三十年巴金研究述评……………（397）
- 人与土地的继续
——新中国历史的一个文学侧面……………（424）
- 构建用材料和事实说话的文学史
——“中国现当代文学编年史”编撰拾得……………（436）

代序 混迹于一代人中间

——我所亲历的新时期文学与批评

—

爱好文学是我们这一代人的通病。因为在我们成长的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除了文学能够寄托我们年轻的心灵，编织我们人生的梦想之外，就没有别的更值得我们眷顾的精神文化处所了。如同大多数爱好文学的少年一样，从小学到中学，我的语文成绩在班上一直名列前茅。记得在故乡黄梅一中读初中的时候，我在某一次包括高中部在内的全校性的作文竞赛中，居然还得过第一名，这因此更增加了我亲近文学的胆量和信心。到了高中阶段，在我就读的黄冈高中，有一位对我的作文同样颇为欣赏的语文老师，居然开始给我在学习上开起了小灶：她在周末常常让我在她的单身宿舍里阅读她为我指定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论文艺的书籍，她自己则在宿舍门前用一个木盘搓洗衣物。就这样，在她的洗衣声中，我接触了当时许多重要的文艺理论概念和命题。这对一个高中生来说，未免要求过高，操之过急，颇有点揠苗助长的味道。虽然当时半通不通、似懂非懂，但经

历过十年“文化大革命”之后，在我的大学时代，当我的同学们在马列文论课上为那些个陌生的外国人名，如斐·拉萨尔、敏·考茨基、玛·哈克奈斯和弗兰茨·冯·济金根在痛苦地绕口令的时候，这些女士、先生已是我久别重逢的故人了。我相信，我在这位恩师为我开的小灶上囫圇吞入的那些概念和命题，是我的一次真正的文学理论的启蒙。我后来无论是从事文学理论批评还是文学教学研究工作的，都与这最初的理论启蒙所培植的根基和趣味密切相关，我因此深深地感谢我的这位文学理论的启蒙导师。

尽管如此，有一点是我当时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到的，这就是我后来居然走上了文学批评的道路。因为所有文学爱好者的终极理想大抵都是当作家，我当然也作过这方面的尝试，从中学时代就开始文学创作的练习，到了“文化大革命”后期从农村招到工厂，居然还发表了一些诗歌作品，成了一名业余作者。记得我刚到武汉大学报到的那段时间，电台还常常播放我的诗歌作品，这颇令我有点得意。在我的大学时代，虽然像我们这些“老三届”中的“老高三”（即66届高中生）知青已经成了这一代人中的老童生，但依然如少年时代那样迷恋文学创作。我在大学时代依然坚持写诗，也发表过散文、小说和报告文学，直到今天，在我的内心，仍然存有一个未了的作家梦。20世纪90年代初，我的创作情绪甚至大有死灰复燃之势，这期间，我曾发表过一个中篇、若干短篇和一些散文、诗歌作品。我的大学同学中确有数人后来成了知名的作家、诗人，但我最终却走上了文学批评的道路。

—
—

我确信这不是我个人的意愿，而是一种历史的选择。在 20 世纪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那样一个历史转折的年代，刚刚恢复正常秩序的大学校园无疑是一切新旧思想剧烈交锋的场所。我们在这里经历了对后来的中国历史影响极大的拨乱反正和思想解放运动，我们用新的理智和热情，清算了在过去因愚昧和狂热所犯下的错误，也因此而获得了精神上的解放和新生。我们开始学会了用自己的头脑去思考，用自己的方式去创造。而对于我们这些刚刚重新获得学习权利的大学生来说，我们在当时所能做到的一切，便是利用极为有限的时间倾注全部热情去从事课余文学活动。今天的人们很难想象当时的大学生对文学狂热迷恋的程度达到了何种地步，我甚至怀疑他们是把红卫兵的那份狂热再度转移到了文学身上。文学在这个年代无疑成了他们倾吐积郁和表达思考的“喷火口”与“喷火”方式。除了如饥似渴地阅读当时能够见到的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尤其是最新的文学创作外，就是围绕所阅读的文学作品和那些不无敏感的文学问题，指点评说，高谈阔论。不论在什么时间、什么场合，只要一接触这些对象、这些话题，就难免慷慨激昂、面红耳赤，乃至捶胸顿足、扼腕撻袖，怒目圆睁，挥拳相向。那时候的学生宿舍，熄灯之后，就是热闹非凡的卧谈时间，依旧是白天的对象，白天的话题，却谈兴高涨，夜复一夜，乐此不疲。而且常常是不知东方之即白，通宵达旦。时人所谓文学的“轰动效应”，就是由这股对文学的狂热劲头引发的。这甚至是全民族的一种文学病态，当时的大学校园，不过是社会的一个侧面罢了。如果没有全民族尤其是青年对

文学的这种痴迷和狂热和在这股文学的狂潮中孕育滋生的那些丰富的文学“话头”，就不可能有“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新时期空前绝后的文学理论批评的兴盛和繁荣。这股文学热潮也因此成了新时期文学理论批评最直接的话语资源。

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大学校园的文学热潮，不能不提到这期间蓬勃兴起的校园文学刊物。几乎每一所学校，尤其是一些综合性大学和文科院校，都有一种或数种学生自办的文学刊物。这些刊物全都是课余编辑，大多为手刻油印，虽然制作简陋，但编者的态度却极为虔诚，工作也极有热情，极为投入。因为集中了当时的校园文学精英，所以这些刊物虽谈不上装帧精美，但质量颇高，较之公开出版的文学刊物，毫不逊色。就对当时读者的影响而言，甚至还高出一筹。据不完全统计，与我当时所在的武汉大学中文系自办的学生文学刊物发生联系的，就有近40种之多。其中较有影响的如中山大学中文系的《红豆》、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的《大学生》、北京大学中文系的《早晨》、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的《初航》、西北大学中文系的《希望》、吉林大学中文系的《红叶》、《赤子心》（诗刊）、《寸草》（文学评论专刊）、杭州大学中文系的《文学公民》、《扬帆》（诗刊）、南开大学中文系的《南开园》、南京大学中文系的《耕耘》、贵州大学中文系的《春泥》、兰州大学中文系的《五泉》、四川大学中文系的《锦江》、山东大学中文系的《沃野》、厦门大学中文系的《鼓浪屿》、《星光》、陕西师范大学中文系的《渭水》、福建师范大学中文系的《闽江》、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的《求索》（诗刊）、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的《秋实》、杭州师范学院中文系的《我们》、湖南师范学院中文系的《枫林》、中央民族学院语文系的《百花》、广州师范学院中文系的《春草》、华中师范学院中文系的《桂子山》、贵阳师范学院中文系的《烛光》

(诗刊)、徐州师范学院中文系的《新潮》、江苏师范学院中文系的《吴钩》、湖南师范零陵分院中文系的《芳草》和南京师专中文系的《求索》、赣南师专中文系的《新芽》、张家口师专中文系的《爱情》(诗刊),以及一些综合性的大学校园刊物如复旦大学学生会的《大学生》、上海师范大学学生会的《百草园》、湖南师范学院学生会的《师院青年》等。我所在的武汉大学中文系也创办了一些学生文学刊物,起先也是手刻油印的,一种叫《珞珈山》,另一种叫《红枫叶》,《珞珈山》坚持的时间较长,影响也较大。这些校园文学刊物,连同以它们为标志的校园文学活动,集中显示了当代中国文学一股“潜在的潮流”。

1979年,由我们倡议发起,同时联络了上述《红豆》、《大学生》(人大新闻系)、《早晨》、《秋实》、《初航》、《希望》、《红叶》、《扬帆》、《我们》、《南开园》、《耕耘》、《春泥》等校园文学刊物,连同我们所办的《珞珈山》,总共13家,共同创办了一个新的校园文学刊物《这一代》。议定轮流编辑,创刊号由武汉大学中文系《珞珈山》编辑部编辑。记得我在当时的五个编委中,分工负责编辑小说和评论,在我经手编发的六篇小说中,有五篇先后被当时公开出版的一些文学刊物转载,作者有后来在文学界产生了一定影响的王小平、曹冠龙等,后者当时还是一位工人作者。最初的约稿中还有一篇是陈建功的小说,议定发头条,原稿的题目似乎叫《面对静静的小河》,后来发在《花城》上的题目叫《流水弯弯》,这是陈氏的处女作,也是他的成名作。最近查阅相关资料,看到一则陈建功的回忆,说是《花城》见到他们寄赠的自办刊物《早晨》后,到北京组稿,看中了这篇小说,当即选走了。陈建功当时正在北大中文系读书,他和后来成为文学批评家的黄子平、编剧梁左、作家黄蓓佳、查建英,和最早报道《红高粱》海外得奖消息的记者李彤等都是

《早晨》的创始人和编者，也算是《这一代》的发起人。在联合发起创办《这一代》的13所大学中，除了北大学生中的这些文学精英外，仅以在《这一代》创刊号上发表作品的作者论，就有后来在新时期文坛产生影响的诗人王家新、高伐林、王小妮，诗人兼诗评家徐敬亚，以及当时虽未在创刊号上发表作品，但却是参与发起创办《这一代》的13家学生刊物的编者或骨干，如后来搅动文坛的“黑马”刘晓波，和从事党史文献研究尤其是毛泽东研究的权威专家，也是著名的文学理论批评家陈晋等。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恢复高考招收的头两届大学生（即77级、78级）中，后来成为诗人、作家和文学理论批评家，最终走上文学道路的，不乏其人。是他们构成了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文学的中坚力量，有的活跃至今，依旧在发生影响。而这些后来的诗人、作家和文学理论批评家，当时几乎都是上述校园文学刊物的编者和作者，或以这样那样的方式与这些刊物有着紧密的联系。在《这一代》的创刊号上，我曾就这些校园文学刊物和“大学生文艺”现象，发表过一篇“述评”文章，题目就叫《潜在的潮流》，现将其中的几段话转录如下：

推动这股文学潮流的是一群年轻人。这群年轻人不是迎着三月的和煦春风，踏着莺歌燕舞，从阳关大道上走过来的，他们是从山里来的，他们是从海上来的；他们爬过崇山峻岭，他们晃过夜海波涛，他们虽然年轻，但是他们大都有一个和年龄并不相称的经历。他们过早地经受了太多的痛苦、欢乐和磨难。因此，他们今天有权利，有义务，也抑制不住要向人们诉说他们曾经经历过的一切、他们今天正在经历的现实以及他们所认为的理想的将来。这似乎有点儿早

熟？是的，一个伟大的然而却经受过长期贫困的民族，一个从浩劫中挣脱出来正向着自由前进的民族，必然要产生这些在各个方面都呈现出早熟迹象的儿女。

.....

这有点和五四运动后在知识青年中出现过的文学新潮相类似。人们爱把粉碎“四人帮”的胜利同五四相比，认为这是又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那么，这股文学新潮就是这次思想解放运动的产物。

.....

五四时代知识青年的文学新潮终于汇入了新文化运动的洪流。我们今天的这股文学新潮也必然要走上这条道路。这是一条有着无限广阔天地、无限发展前途的社会主义文学的阳光大道。党在关注着我们，老一辈在扶持着我们；人们会欢迎我们的，同学们，努力吧！

关于《这一代》，已有主事者如我的同学张桦写过一些回忆的文字。与这个刊物发生关系的一些文学界的前辈，也在一些谈话和文章中提及此事，有的还写过专文，如诗人公刘等。就它的整个过程而言，是颇带戏剧性的。起先，从系领导到校领导，都是表示支持的，还给予了一些经费上的帮助。甚至连当时的团中央和教育部的有关领导，得知此事后，也给予了支持和鼓励。因此它的前半部分的工作，还是进展得十分顺利的。我们甚至把刊物的主要稿件，派专人送到了北京，交到正在参加四次文代会的张光年同志的手里，希望得到这位文学界老前辈的首肯和支持。据说张光年同志对大学生的这股文学热情和文学水平，深表赞赏，并指示参加会议的公刘同志撰写一篇评论文章，在《人民日报》予以推荐。但当刊物在当时的《长江日报》印刷厂印制

的过程中，却有人指出其中的作品有政治问题，具体是指哪一篇，现在已不得而知，但后来一个较普遍的说法，都认为问题主要是出在王家新的《桥》和叶鹏的《轿车从街上匆匆驶过》这两篇诗歌作品上面。前一首诗以中国的政治心脏中南海与群众的消闲游乐场所北海公园之间的一座石桥为题，立意在领袖与群众、党和人民之间应该有一座自由出入沟通的桥梁，而不应该用岗哨隔离开来。后一首诗实际上是取材于中央电视台一则真实的新闻报道，即在繁华热闹的王府井商场门口，从中央首长坐的红旗牌轿车中走出的，不是为革命工作劳碌奔波的中央首长，而是他们的保姆、子女和七大姑八大姨。作者借这则新闻揭示了与街上“匆匆驶过”的各种轿车有关的特权现象，立意同样是在密切干群关系，但都因为诗人喜好想象和夸张，说了许多过头的话，用了许多不恰当的比喻和极端的表达方式，引起了一些同志的高度警惕。于是《长江日报》的领导决定停印。虽几经交涉，终无结果。最后只好将一部分封面套过色一部分还没来得及及套色，而且有的稿件也残缺不全的刊物拉回学校，在封二加写了一个油印的《告读者书》后，分送各地参与主办的学校自办发行。因为是没有刊号的非正式出版物，所以，各地学校在自己发行刊物的过程中，还与有关管理部门发生过矛盾和冲突，有的甚至还被当地公安部门强行没收。与此同时，这个刊物的“问题”也被反映到了上层，受到了上层领导的严厉批评。在这种情况下，上述各级领导部门再难表支持，公刘的推荐文章自然也不能发表了，而且据他在有关文章中说，后来还因此事受到了牵连。但实事求是地讲，各级领导在处理这件事时，还是十分谨慎的，一般来说，并没有给我们这些学生施加压力，而是从正面予以启发和引导。由此，也足见“文化大革命”以后中国的社会政治所发生的可喜变化。

作为一本校园文学刊物,《这一代》虽然当时就命运多舛,后来更难以继,校园文学活动也因此走入低谷。但我确信,这是我的文学批评活动的真正开始。这个开始无疑是与这一代人的整体文学活动紧密联系在一起。这使我此后便混迹于这一代人中间,从那个时代直到今天,经历了一个文学批评由盛而衰的历史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说,我的文学批评生涯并非纯粹个人文学活动的记录,而是一个亲历者对于一个文学批评时代的证明。

三

记得有人曾在《光明日报》上写文章论中年批评家,严格说来,作者所论的中年批评家,只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期才可称为中年,而现在,则大多数都进入了人生的老年阶段。这些当时的中年批评家今天之所以还值得一论,是因为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新时代,即新时期文学批评是始于他们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文学批评活动。正是他们在这期间的文学批评活动,不但有力地推动了文学界的拨乱反正和思想解放,保护和促进了这期间文学创作的健康发展,而且也有效地恢复和发扬了在我国新文学史上长期以来占据主导地位的社会历史批评传统。我个人即是在这一代中年批评家致力于恢复和重建这一批评传统的过程中走上文学批评道路的。

20世纪80年代初,恢复活动不久的湖北省文联和省作协,为贯彻党的十二大文件精神,加强文艺理论工作,决定成立文学理论教研组。这个教研组由时任省作协主席的老作家骆文和副主席王淑耘夫妇主持。小组的主要成员有十几名,大多是来自武汉地区高校的中文系教师,尤其是武汉大学、华中师范学院和湖北

大学的教师，以及作协从事理论批评工作的同志。我现在能记得起来的有如下数人：骆文、王淑耘、刘岱、吴耀凌、吴芸贞、田中全、刘森辉、易竹贤、陈美兰、周迪荪、於可训、孙子威、曾祖荫、王先霈、周勃、郁源、邹贤敏、姜弘、古远清、程克夷。此外，经常参加活动的还有武汉地区一些社会科学、文学期刊和报纸副刊从事文学理论工作的同志，如高逸群、易原符、王春桂、黄榕、陈柏健等。这个研究组的主要成员大部分是文学前辈或我的师长，有的直接就是我的业师，我虽已 30 出头，但却是个刚刚毕业的大学生。这个小组的活动，我记得主要有如下几项：一是组织学习文艺方针政策；二是深入生活参观访问；三是研究文艺理论和创作问题；四是评论作家作品。有时也把这几项活动结合起来进行，记得有一段时间，反映农村经济改革的作品很多，为了深入了解农村的改革情况，我们到襄樊地区参观了一些县、社（公社）、生产队，也访问了一些农户和承包企业，得到了不少感性认识，也获得了不少一手资料，然后结合作品就地召开研讨会。这样的“理论结合实际”，感觉要比关在家里纸上谈兵深入切近得多。像这样的文学批评方式，今天操持各种新式武器的批评家可能会嗤之以鼻，不屑一顾，但对于那个年代占据主导地位的社会历史批评而言，却是一个十分重要而且颇有创意的实践环节。因为上述作家、学者和批评家，大都接受过马列文论和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教育，服膺唯物辩证法的思想和社会历史的文学批评方法，又都有丰富的中外文学知识，有的还是某一文学领域的研究专家，在这样的环境和气氛中，我所接受的自然是社会历史批评观念和方法论的影响与熏陶。我深深地感谢这个小组的师长们对我的帮助和教诲，我也十分感谢这个小组给我这个初出茅庐的年轻人一个宝贵的学习和实践的机会。虽然如今已很少有人能记起这段历史，但我却铭记在心，莫敢或忘。

因为上述原因，所以，我的文学批评活动从一开始就不能不打上社会历史批评方法的深刻烙印。尽管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文学界就开始引进西方各种新的文学批评方法（1985 年甚至被称为“方法年”），但我个人的经历、学养、素质、趣味和爱好却使我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依旧固守社会历史批评的观念和方法。我相信这种虽然古老但却远没有失去生命活力的文学批评方法，对于 20 世纪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的批评对象是完全适应的。我们与作家共同经历了那些非常的年代，与他们有着相同的或大体相近的人生经历和精神历程，在那个文学和人学同时获得解放的年代，我们都希望借文学来言说社会人生，他们所言说的，也是我们所要言说的，被他们所言说的，同时也被我们所言说。我感到文学批评从来也没有像这个年代在主体和对象之间达成这样高度的同一性。我从这种具有高度同一性的文学言说中获得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写作的欲求和冲动。此时正是我大学毕业后留校工作的一段时间，在繁忙的教学和我所担任的兼职党政工作之余，我同时也开始了紧张的文学批评写作活动，写下了一些作家作品评论和创作研究文章，这些文章为我后来的文学批评生涯铺平了最初的道路，同时也为我后来的文学批评奠定了方法论的基础。我确信这是一个社会历史批评的时代，我的同代人和当时被称为中年批评家的上一代人都是操的这种批评的武器。他们运用这种武器取得了社会批评和文学批评的双重胜利，他们因此重建了一个新的文学时代和批评时代。从他们的批评活动中，我们也不难看到这种古老的（或曰传统的）文学批评方法在 20 世纪下半叶的中国文学中所闪现的最后一点历史的余光。因为我最初的文学评论工作的成绩和日渐产生的影响，1982 年，我加入了中国作协湖北分会，在 1985 年召开的省作协第二次代表大会上，被举为作协理事。